

書 評

吳 啟 訥*

Klimeš Ondřej

Struggle by the Pen: The Uyghur Discourse of Na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 c.1900–1949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5; xiv + 280 pages. ISBN 9789004288096

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新疆現代政治史研究，在數量上已可謂汗牛充棟，有過度研究之嫌；從思想脈絡的角度，研究新疆的突厥穆斯林知識菁英在這段歷史大轉折期的思想轉型的著作則相對較少，且多數附著在政治史、族群關係史的研究當中。

年輕的捷克裔學者林昂（Ondřej Klimeš）從十多年前開始關注 20 世紀前半期新疆穆斯林社會的歷史，將焦點集中在新疆突厥穆斯林知識分子的思想脈絡之上。在博士論文中，林昂透過解析新疆突厥穆斯林知識菁英的寫作，包括歷史寫作、回憶錄、文學、新聞報導、政論和政治文宣品等，勾勒出維吾爾民族主義意識萌生和初步生長的時代場景。本書是林昂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改寫的專著，它更注重以維吾爾人自身，而非以中國史上的「邊疆」或維吾爾身為「中國邊疆人群」、「中國少數民族」的視角來重建 20 世紀前半期的新疆歷史。

2017 年 12 月 11 日收稿，2018 年 2 月 1 日修訂完成，2018 年 4 月 25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Wu Zhe,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事實上，儘管中國的中央王朝政治勢力與漢人早在西元前即已抵達新疆，但直到 18 世紀中期為止，才對新疆產生持續——但仍然不是全面的，尤其不是文化上——的影響；13 世紀以來伊斯蘭和蒙古人，在形塑近代新疆社會上扮演過更吃重的角色，卻同樣未能深入綠洲社會的思想深層。當中國農耕王朝、北方游牧帝國和東來的伊斯蘭政教力量——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將新疆視作「戰略樞紐」之際，並不需要太關心新疆這些綠洲和草原居民的內心。然而，綠洲居民自身的文化和思想在歷史的表層之下持續流動著。林昂這部著作是以此為出發點伸展到 20 世紀的綠洲，在民族主義理論的解釋框架之下，逐步揭示從 20 世紀初葉開始，突厥穆斯林知識菁英的想像和思維，如何從其原生狀態逐步演變到民族「覺醒」和民族主義狀態的過程。

這部書的第一章，向讀者展示了 20 世紀最初 10 年——與清末同步——的突厥穆斯林知識分子在面對漢人和漢語穆斯林移民時，基於明顯的文化因素，對處於半自治狀態的自身社群的想像，這樣的想像無疑包含著成為民族意識的可能性，但其是否會導向「民族」覺醒，仍是未知數。第二章討論 20 世紀的第二與第三個 10 年，伊斯蘭現代教育發酵後，突厥穆斯林走向「民族」思維的早期過程，其中凸顯與 20 世紀初葉的重要差異，即在「民族」語境下，重新追溯「民族」祖先之舉，而此舉標示出「民族主義」的方向。第三章對比了作為第一次「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精神領袖之一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Mohamad Imin Bughra）與——代表漢人對新疆政治宰制的——盛世才兩方分別基於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和蘇聯式「民族」話語的政治合法性論述，凸顯 20 世紀第四個 10 年——1930 年代「啟蒙」典範的引進與民族主義的政治化。第四章則展現 1940 年代戲劇性民族主義武裝衝突背景下，具有蘇聯背景，建立第二次「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突厥穆斯林左翼民族主義者與——標舉「中華民族」與「民主政治」旗號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在民族主義論述上的對峙。

讀者從本書的研究中還可以推論，儘管維吾爾民族主義、蘇聯版的民族論述，以及中華民族主義都共享著「現代化」典範，但對於突厥穆斯林知識菁英而言，包含現代化論述的伊斯蘭復興理論、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伊斯蘭極端主義、以

及最終成形的維吾爾民族主義，都被本地中心主義改造為自身的版本，其內容往往充滿流變和衝突。

本書的寫作策略也包括將思想脈絡連結到政治演變當中。讀者將發現，突厥穆斯林知識菁英透過對一系列族群政治衝突的解讀，以及利用族群政治事件所做的動員，促使散佈在數十個綠洲當中的居民在衝突之中將自身想像成為某一大範圍人群的一員，而這正是維吾爾民族主義從紙上散播到現實當中的必經步驟。

當然，這部針對新疆突厥穆斯林知識分子民族主義思想脈絡的著作也存在盲點。事實上，「民族主義」是一個傳統的學術關照點，本書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可以歸類在較為傳統的歷史寫作範圍之內，然而不論是政治上還是思想、文化上，「新疆」和「維吾爾」的歷史——在很多層面上——對典範的「民族」和「民族主義」構成挑戰，這部於 21 世紀第二個 10 年成書的著作對於這些挑戰的關注並不充分。

首先，維吾爾民族主義理論的形成不是突厥穆斯林知識菁英單獨思考的結果。地處歐亞大陸中心的新疆，較晚接觸到工業化社會的影響，這裡接觸現代世界的資訊，大致而言是間接的。前現代突厥穆斯林知識界的知識結構大致由「蒙古」、「伊斯蘭」、「突厥語言」和「契丹」（包括中國的朝廷、貨物和文化）這幾個部分組成；20 世紀初期，突厥穆斯林知識界對世界的了解，多數來自鄰近的俄國—蘇聯、有文化親緣關係的歐亞大陸突厥語族世界和新疆政治的主導族群——漢人的知識界。「維吾爾」是俄國人、漢人統治當局和突厥穆斯林知識界共同「重新發現」、發明的一個「民族」；突厥穆斯林的民族主義最後被著色為「維吾爾民族主義」，也是蘇聯與漢人參與的結果，無論這種參與是推動還是壓制。

其次，本書在討論新疆政治演變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忽略了一個重大政治史因素：突厥穆斯林「我群」意識形成，以及將在清朝被稱做「纏回」的維吾爾與整個「新疆」連結起來，從而構成維吾爾民族主義的基礎這一現象和結果，與清朝對新疆的統治有著直接的關聯。8 世紀以來大致定居在塔里木盆地各綠洲的突厥語穆斯林，分布範圍於 18 世紀中期以後擴展到準噶爾盆地，乃是清朝「以回制準」政策的結果；而較大範圍「我群」意識的萌芽，又與清朝在新疆實行的「漢回隔離」政策有關。

當然，這部書的貢獻仍然必須得到肯定。新疆是 21 世紀中國「一帶一路」規劃當中不可或缺的鏈條，但卻是這個線路中最容易鬆動的一個環節。本書揭示出這一現象背後的一段原因，對於世人理解新疆大有助益。